

一個抗疫的分析框架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Fighting a Pandemic

何懷宏

He Huaihong

摘要 Abstract

自 2019 年底，新冠病毒開始在全球傳播。本文就新冠病毒提出四個基本的分析範疇：自然、人性、技術及權力。基於這個基本範疇之間相互關係，作者認為，在過去三年的抗疫經驗中，我們看到不同範疇的組合可以演繹出不同的對疫情的看法以及抗疫的模式。在此論點上，作者分析界定疫情和抗疫理論的可能性。

After the outbreak at the end of 2019, COVID-19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glob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viruses comprising four basic categories: nature, human nature,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何懷宏，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首席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鄭州，郵編：450001。

He Huaihong, Professor, China Zhengzhou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450001.

《中外醫學哲學》XXI:1 (2023 年)：頁 75-9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1 (2023), pp. 75-92.

© Copyright 202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power. The paper shows that different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se four basic categories influe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pandemics and of how a pandemic like COVID-19 should be fought.

【關鍵字】 新冠病毒 自然 人性 權力

Keywords: COVID-19, nature, human nature, technology, political power

讓我們從簡單觀察和比較百年來兩次最大規模的流行病說起。上世紀的 1918-1920 年，歐美印度等地發生了“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 2,000 萬到 5,000 萬人死亡，感染數和致死率不能確知。過了一百年，這個世紀的 2019 年末，又發生了新冠疫情。在經歷了三年多新冠病毒肆虐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終於在 2023 年 5 月 5 日宣佈，這次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全球衛生緊急狀態結束。據統計，到 2023 年 3 月 10 日，新冠病毒造成了 6.76 億人的感染，688 萬人死亡。

這也許是這一百年兩次最引人注目的流行病災難。它們還不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病疫——天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被消滅之前，在 20 世紀據稱死了 3 億人，而愛滋病則在發生之後迄今已經死了 3,500 萬人。但是，前者是持續了多個世紀，後者是持續了多年，都不是集中在短時間內、甚至是暴起暴落的大疫。

上世紀初大流感的死亡人數幾乎是這次新冠疫情的十倍，而且死去的多是年輕人。對其原因的一種猜測是，1918 年的流感病毒同 1889 年大流感期間的病毒相似，1918 年大爆發時，老一代人攜帶了 1889 年獲得的抗體，這些抗體保護了他們。但這次造成的驚恐和喧鬧更多，政府和各界的用力也遠超上次，死亡的多是老年人和基礎病患者。

20 世紀的 70 年代大概是人們對大流行的傳染病認識的一個轉折，此前許多醫學專家認為有了抗生素和疫苗等現代醫療技術，再加上日益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傳

染病已經不是人類大患，現代醫學可以將注意力主要轉向如心臟疾病等方面。但是，不久就出現了人們“談虎色變”的愛滋病，然後在新世紀出現了三次新的冠狀病毒流行病。而這也讓我們預感到未來傳染病大流行也不會稀少或絕跡。在人類的三大致死原因——戰爭、饑荒和瘟疫中，戰爭是人為的，饑荒有天災也有人禍，但按照阿馬蒂亞·森的觀點，現代的饑餓如果轉成大饑饉，那幾乎都主要是來自人禍。瘟疫過去都是自然的原因，但如果出現生物戰和實驗室洩漏，那也就有了人為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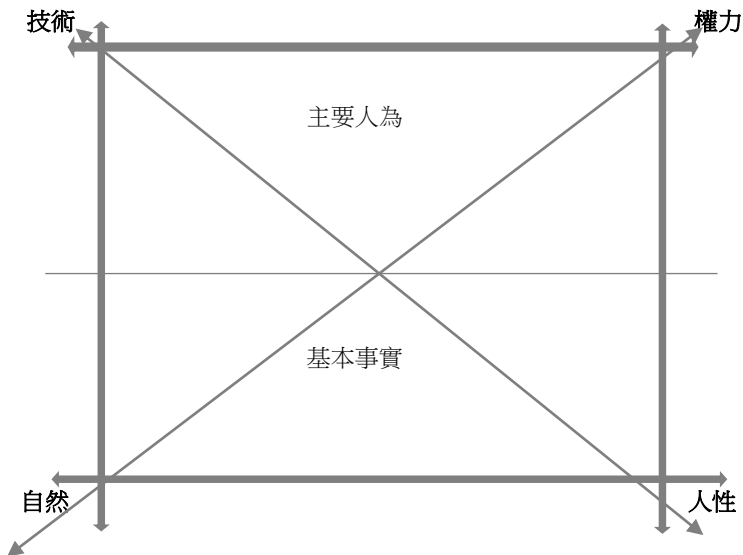
所以，我想，我們不得不重視這樣的危險，我們不能白白經歷這一場災難。上一次西班牙大流感的死亡人數超過一戰的死亡人數，但是遠遠沒有得到像一戰那樣的研究和反省。這一次我們應該盡量弄清新冠疫情的來源、爆發的原因、變異的機制、疫苗和治療藥物的效力等，同時也應該好好檢討我們的政策和舉措的得失。所以，我雖然對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是個外行。但畢竟也是和大家一樣捲入了這場疫情，作為一個親歷者，也還是可以嘗試做一些宏觀的觀察和或許具有哲學意義的思考。

我現在在此提出一個抗疫的分析框架。這裡的“疫”是指一種傳染的流行病疫 (endemic) 乃至大流行病疫 (pandemic)。當我們說到“病”的時候，那是常常指個人的疾病，但說到“疫”的時候，那就是流行於群體的傳染疾病了。中國歷史上屢有“大疫”的記載，只是常常過於簡略。有時會談到後果，但不清楚原因。西方在現代循證醫學發展之前，也多是記錄，直到生物學、免疫學等漸漸發展，我們才知道了這些病疫是來自細菌和病毒等，但還是不能準確的指出其來源，更難以預測。它們往往是來無影而去無蹤，只是週期性的出現，作為疫情永不絕跡。最近五十年來新的傳染病的不斷出現，乃至一些老的傳染病死灰復燃，說明人類的對病疫的預期還是過於樂觀了。但無論如何，當每次病疫發生之後，人類自然也會努力抗擊，以各種辦法應對，在這種抗擊中常常體現出一種立足於基本倫理的英雄主義精神，最後疫情過

去，但卻完全沒有辦法說人類對傳染病取得了徹底的、更非最後的勝利。我現擬提出的這個分析框架，自然也需參照歷史的經驗，但還是以這三年多的新冠疫情為主要的觀察對象。

我還想在此說明：這只是一個我嘗試的概念分析框架，不是經驗的實證研究，更非科學的指南，而只是一種對大勢的觀察和思考。我試圖觀察和思考的物件是真實的，但這一框架作為一個概念的系統框架卻是一種理論的設計，用來簡化各種抽象化的要素以便分析。這裡也不是對一兩個政治社會的觀察，而是對世界的觀察。我不奢望一定得出明確的結論，而只是希望概念和事實清楚。概念要清楚就必須做一些定義，其實也就是做一些限制。而事實也要盡量清楚——這首先意味著哲學的思考應該絕不脫離事實，而事實也應該是盡量可靠，包括不明顯違反我們作為親歷者的經驗。如此，這個分析框架、或者其中的某些範疇能夠給深入探討抗疫的研究者帶來一些啟發

我想提出的四個基本的分析範疇是：自然、人性、技術與權力，其大致的輪廓圖示如下：



圖片說明與相互關係

這四個分析範疇或者說四個抗疫要素大概可以用於對所有疫情應對的分析，但我這裡主要是用來分析新冠疫情。圖下端的兩個概念“自然”與“人性”涉及即成事實，而且其基本事實是難於改變甚至不可改變的。廣義的說，人也是屬於自然的，是自然界的一種高等動物。但人又還有意識和精神的層面，包括這些精神和意識的共同性和差異性，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我將注意這共性和殊性的兩面，但更多是從人的差異性著眼：一是人的外部差異性，和最接近他的動物的差異性，亦即人的精神和意識。二是人的內部差異性——這裡我想強調的是人們的民族性、國民性。我也是想從人們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核心意識——價值觀來分析人性，即主要是關注人在不同政治社會和民族中表現出來的差異性。這種價值觀不是試圖理論構建的價值觀，而是事實上存在的價值觀。越是廣泛和普遍的人性越是基本，也就越是難於改變，至少人們事實上已經形成的價值觀在疫情的短暫期間難以改變。“自然”和“人性”中的基本事實不變，但其細節又都處在一種不斷的變化狀態之中。於是抗疫面對不同的物件的認識就變得相當重要，根據物件的變化採取與時俱變和因地制宜的對策也就變得相當重要。

我們還需注意到，上圖還展現了一種各個因素之間互動的關係：亦即包括橫向的、縱向的和交叉方向的互動。從橫向的方面看，上端的兩個概念“技術”與“權力”也就是人們的主要的作為範圍。它們涉及人的主觀能動性，對現實的積極作為。左邊分隔號的“技術”主要是對自然的控制；右邊分隔號的“權力”主要是對人的控制。技術與權力如果完全合力，甚至有可能造成一種極權主義社會。技術與權力總是處在一種互動關係之中的。技術的高度創始性發展有賴於權力留出自由創造和投資的空間，其大規模應用、如何應用（包括主要應用那些技術）也是會受到權力的鼓勵或者限制。技術可能成為權力的工具，但如果僅僅作為

工具，又會限制其創造性。技術也會影響權力，可能加大權力的控制力，但也可能留出一些權力所不能及的楔口。下端的兩個概念“自然”與“人性”也總是處在互相影響之中，人本來也是一個自然物，人性是從自然中脫穎而出的，但它反過來又影響自然，改造自然，人今天甚至成為地球上自然界的主人。

然後還有縱向的互動：在人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技術發揮了最為突出的作用。權力也試圖改造人性，甚至創造出新人，但是，無論自然還是人性，都會努力抗拒技術與權力的過分僭越的企圖，依然保持基本的自身。最後還包括有一種交叉關係：亦即技術和人性也是互相影響的，技術甚至比權力更有可能改變某些人性的某些方面——比如通過基因工程，而人性中的價值觀也會影響技術的發展。權力與自然也是互相影響的，權力若是變得驕橫，會向自然開戰，甚至試圖一勞永逸的戰勝自然（比如向病毒發起“最後的總攻”）。在抗疫中，戰爭的思維和語言容易大行其道，但其實自然同樣會對權力構成某些基本的、不可逾越的限制，乃至像反人性者必受懲罰一樣，反自然者也必受懲罰。

總之，上面所說的四個因素都處在一種雙向和多向的互動關係之中。它們不僅是一個個的單獨起作用的，也不止是一對對互相起作用的，而是所有這些因素都處在一個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的體系之中共同地起作用。

因此，我這裡想強調的是：我們分析疫情和抗疫，必須全面的考慮這四個因素，而不是只考慮其中的一、兩個因素，比如不是只考慮科學技術，也不是只考慮政治能力，或者只考慮這兩者，覺得人類可以任意實現自己的目的，而看不到自然和人性的基本限制。當然，我們也不能只考慮下面的自然和人性，覺得人類只能無所作為。只強調一兩個因素，就有可能走向唯科學主義，技術萬能論或者唯權力論，政治萬能論；或者一切交給自然放任。我們要反對不尊重自然和人性的激進主義，也要反對完全清靜無

為的寂靜主義。不過，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更需要拒絕的是一種對自然的傲慢。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分析各個範疇：

1. 自然

第一個分析範疇是“自然”。

“自然”也就是指自然界，主要是地球上的自然界。我們這裡主要談自然界的各種病毒細菌等病原體，和各種動物身體（包括人體）自身對各種病毒的不同程度的自然可感染傾向和自然免疫力。自然界有細菌和病毒是自然的，人有免疫力也是自然的，來自外部的病菌和自身的免疫力兩者本身就構成一種永恆的矛盾和平衡。

大流行的傳染病的病原體來自細菌、病毒、寄生蟲等。它們和生命同時起源，甚至就是生命的源頭，在地球上還有幾十億年的歷史，遠遠超過人的歷史，而且將和生命永遠共存下去。桃樂西·克勞福德 (Dorothy H. Crawford) 在《病毒》(Viruses) 一書中指出，原始微生物大約在 30 億年前就出現在地球上了，但直到 19 世紀晚期才被人類成功分離出來。(Crawford 2018) 其中病毒是細菌數量的十倍。全世界的病毒數量超過了所有其他形式生命的數量之和。病毒是地球上數量最多、歷史最久的微生物，是地球真正的“原生土著”。病毒的多樣性也同樣驚人，據估計，全球約有 1 億種類的病毒。而且，很有可能，在人類消失之後、它還會生存下去。甚至有人預測，當人類遇到毀滅性的核戰等大災難時，可能只有病毒還留存下來，而它們可能就是日後在地球上復活生命的“種子”。它們無處不在，瀰漫在海洋、天空和大地之中，也存在於我們的身體內部。我們始終和它們共存著，並將永遠共存下去。

有致病的細菌，也有益生的細菌。“病毒”也只是我們基於人類的立場對它們的稱謂。卡爾·齊墨 (Carl Zimmer) 在《病毒星球》(A Planet of Viruses) 中解釋說：“病毒”(virus) 一詞承自羅馬帝國，當時的意思是蛇的“毒液”或者人的“精液”。(Zimmer

2012) 也就是說，這個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毀滅”和“創造”的兩方面的意思。萬物都在適應環境和競爭中求生，此即所有生命體的“生生不息”，也就是我們面對的充滿生機的“大自然”。

還有些後來對人類造成大災難的病毒其實是和文明共生並進的，是人類文明帶來的。阿勒普·查克拉博蒂在《病毒、大流行及免疫力》一書中指出：農耕社會之前，不存在導致流感、麻疹和新冠肺炎的病毒，直到我們的祖先學會了如何種植農作物才產生這些病毒。在採集狩獵階段，小群體的人們在山林中遊蕩，不容易發生流行疾病，而自從進入畜牧耕種的農業文明，人們聚集到一起，有了鄉鎮和城市，才有了各種流行疾病。而到了工業文明時期，還出現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大流行才成為可能。到了全球化的高科技文明時代，才有了世界大流行疾病。而造成大流行的冠狀病毒則可以說是新世紀的新產物。

我這裡所說的“自然”還包括人的身體，從身體而論，人也就是自然界的一種高等動物，接受自然的演化規律，接受自然界的各種饋贈和侵襲，接受來自自然界的種種幸運和不幸。面對病菌，即便是相當簡單原始的生物，也是具有某種自然免疫力的。至於人的免疫系統，那就更複雜和精密了。人對某些病毒和細菌是易感的，但他也擁有某種自然的免疫能力。這種自然的免疫力分為兩種，一種是先天的免疫力，它構成人抵抗病毒和細菌的基本盤；還有一種是適應性的免疫力，它是不同的病菌是具有針對性的，也常常是後天獲得的（但母親在胎盤中就可以給予胎兒一些適應性免疫力）。桃樂西·克勞福德在《病毒》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解釋。作者認為：人從大自然獲得了兩種最有效、最巧妙的兩種免疫原理：先天性 (innate) 免疫系統和適應性 (adaptive) 免疫系統。(Crawford 2018) 先天性免疫系統包括所有與生俱來的、在遇襲後馬上就能調動起來的免疫機制。它們是人體的基本防禦機制，其核心特徵是智慧，有能力區分自身和異物，一旦檢測到異物就會快速反應。不過，先天性免疫沒有針對特定敵人的

定制武器，而是無差別地大範圍攻擊各種敵人。適應性免疫系統則能對入侵病毒產生特異性應答，這種定制化的特異性免疫反應的產生需要一定時間。如果我們僅僅依靠適應性免疫，當它武裝起來、準備戰鬥時，入侵的病毒將會成倍地繁殖並擴散到全身，這會讓我們早就被擊潰了。而固有免疫系統可以讓我們在適應性免疫系統發揮作用之前活下去。

病毒和有害細菌與人的自然免疫力構成了一種永恆的對抗和競爭。人其實在不知不覺中就已經得到了自然免疫力的巨大好處，沒有這種自然免疫力，他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人類在現代發展起來的種種新興抗疫技術，也歸根結底要通過調動起和落實人類的自身免疫力發揮作用。所以，永遠不要漠視和輕視“自然”，永遠要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上傾注主要精力。如果自然免疫力能辦到的事情，我們就不要人為的干預。不恰當的和過度的人為干預反而可能壞事。

這裡我們可以分析兩種自然現象（或許其後還有某種規律）。一是人們常常說的一句老話：“大疫不過三年”。這看來不是一個科學的概括，而只是一個經驗的觀察。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大疫很少超過三年：比如 1348-52 年肆虐歐洲的“黑死病”（在一個個地區一波波推進），又如在 1918-20 年在美歐爆發的“西班牙大流感”。都基本就是肆虐三年或三年多點。在當時的條件下，即便沒有現代科學對病毒細菌的病原認識，也沒有現在的預防和醫療技術，大疫也沒有超過三到四年。這後面的原因是什麼呢？大疫為什麼突然而退呢？英國的一個村莊的村民曾經在一次瘟疫期間，堅持不逃離不擴散，但是最後也還有一半人活了過來，而不是全村人都死去。這是病毒的“善意”或“自然的慈悲”？當然不能這麼簡單解釋。但人類也不要自炫自己能知道一切秘密，今天我們對許多大流行病的成因、源頭還是不太清楚，許多事情基本還是一個謎。

“大疫不過三年”或許反映了一種自然本身的調節，其最深處是難以為我們透徹知曉的“自然黑箱”。“大自然的慈悲”只是一種隱喻的說法。大自然沒有動機。但這可能是一種大自然的自發平衡和自然調節。也可以在道理上說得通。如果一種病毒太厲害了，它殺死了許多宿主，就難以傳播了。自然界本身有一種微妙的平衡和迴圈。比如利奧波德在《像山一樣思考》中所說的一種平衡：狼—鹿—大山的植被。人如果介入這種平衡，殺狼而保護鹿，把狼殺光了，鹿過度繁殖，踐踏植被，大山就要變得光禿禿了。這樣，鹿也就要因為食物短缺而大量死亡。

還有一個有待解釋的自然現象：那就是造成流行病的病毒，要麼是傳染率高而致死率低，要麼是致死率高但傳染率低。以七種能傳人的冠狀病毒為例，有四種造成普通感冒的傳染率(R0)較高，但致死率很低。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的致死率很高，大約 35%，但傳染率很低，大約是 0.75 或者說小於 1；薩斯（冠狀病毒 1）的病死率也是較高（大約 10%），但傳染率較低（大約 3.8 或者說 2-5）。這次新冠病毒（冠狀病毒 2）的資料不是很確切，且處在變化之中，其前期致死率大概 1-3%，而傳染率則大約是 1.4-5.5。而到了奧密克戎，傳染率高達 18-20，而死亡率則降至 0.1% 以下。另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一種現象，那就是一些病毒開始出現的時候致死率較高，慢慢的傳染率升高而致死率降低——這次新冠病毒從初期的原始毒株到德爾塔、再到奧密克戎也是這種情況。病毒的發展趨勢看來一般不是以增加致死率為優先（宿主的死亡也意味著它要同歸於盡），而是以擴大傳播和繁殖為優先。

考慮到上面兩點，人為的政策和措施其實也就要及時調整，不要死扛、也不必死扛。而是要順應自然，與時俱變。

2. 人性

“人性”也屬於一種廣義的自然。在英文中，*nature* 表示自然，也表示一種性質，一種本性——包括人的本性。但我們在此

將“人性”抽繹出來，因為我們這裡所強調的“人性”主要是人區別於其他自然物，包括動物的特性，也就是意識和精神的特性。這尤其是指人的“知情意欲”四個部分，而其核心是人的價值觀。

人性具有普遍和共同的一面，也有各種特殊的差別性，在我們的論題中，將特別強調不同的民族性；普遍性是人之共同性；民族性是人之差異性的一種。也就是說，我們在此，是強調人性的外部差異性——人和其他最接近它的動物的差異性；精神、意識和價值觀；也強調人的內部差異性，即在各個民族和國家裡有所不同的價值觀。

人類共有的價值觀至少有一種是普遍的，那就是追求生而不是死，相應的也就是希望健康而不是疾病。中國古代對人性的最早解釋就是“生之謂性”，這可以視作是一個事實的陳述。而儒家宣導的“生生大德”，或者說“生生之謂性”，就還有了一種道德價值和規範的意義，即不僅自己求生，也關心和照顧別人的生命 (live and let live)，將生命視作一種普遍價值。這個生命價值是最優先的，所以，我們常常說“生命至上”，但我這裡想做一解釋：即生命恰恰是因為至低而至高，因為至下而至。也就是說，肉體生命是人類群體和個體要延續和發展最起碼的條件，是最低標準。人只有活著，才能談得上其他。我們主要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生命至上”，而並不是說“活著”就是我們的最高價值追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求生畏死”是人性中最普遍的價值，無論各國各文明的人民，都是將保存生命看做最優先的，第一性的。

但是，我們卻要注意：生命最優先並不是“生命無價”，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保存某個人或某些人的生命。這裡我介紹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湯瑪斯·索維爾的觀點，他在《這才是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中談到：有一種論點認為，如果能拯救哪怕一個人的生命，花費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但他同時認為：雖然這種觀點在道德和感情上有著強烈的號召力，但是在稀缺資源具有多種用途的

世界裡，它是經不起推敲的。稀缺資源的多種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種方式來拯救人的生命。(索維爾 2020) 而沒有什麼事情能比（經濟和）財富的增長更能拯救人的生命了。一場大地震使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 12 個人失去了生命，但是若發生在不太富裕的國家，則可能導致幾百人喪生，在貧窮國家甚至可能導致幾千人死亡。可能有人會說，不應該給一個人的生命設定價格限制。但是，不論這些話聽起來多麼高尚，在真實世界裡，沒有人願意花費國家一半的年產出，來讓某個人多活 30 秒。給第三世界國家的許多兒童注射針對致命疾病的疫苗平均成本很小，卻能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包括每個兒童的壽命都延長了幾十年。同時為幾個 80 歲的老人做心臟移植手術費用非常高，而且即使移植手術完全成功，也只能增加很短的壽命。如果這兩件事花費相等，且只有一筆錢，我們該如何選擇呢？不是更應該考慮將僅有的一筆經費用於前者嗎？

我們需要現實一點。為了消滅某一個疾病，或者為了任何一個生命的存續（以及哪怕多存續幾天）都要不惜一切代價是不現實的，因為資源或成本都是有限和稀缺的，用了在這裡就用不到那裡。這還有一個誰來支付的問題。其實我們看到中國的不少窮人因為搶救或維持生命的費用昂貴（有時甚至並不很昂貴、只有幾千或幾萬元）而放棄治療。政府保存生命也是需要付出成本、付出代價的，因為它自身並不創造財富，看似免費的東西最後還是要由國民個人來承擔。這就需要在延續這一些生命和那一些生命之間做出權衡。同樣是遵循“生命優先”的原則，但是，究竟優先挽救那些人的生命，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必須仔細和負責任的權衡。還有一個代際的考慮，我們不可能為了再多延長一兩個老人在 ICU 裡的幾個月生命，就犧牲許許多多年輕人的生活前景。我們也不能說只是某一種病才是病，而忽略其他同樣會奪取人的生命的疾病。當我們說要“不惜一切代價”的時候，要考慮這代價可能就是他人的生命。

另外，我們還要注意人性的內部差異，注意價值觀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和政治社會裡的次級差異。即便是同樣贊同“生命優先”，但是因為人還會想要追求自由、追求法律的平等或經濟的平等、追求優秀和卓越等其他價值，在生命價值和其他價值之間就還會有比較和權衡。如果生命遇到的危險很大，人們就可能暫時放棄其他價值。但如果生命的危險不是很大，死亡的概率不是很高，那麼，人們就可能還要兼顧其他價值。當然，這種權衡在不同的民族和政治社會中是有實際差異的。有些國家的人們可能更傾向於無論如何要活下去，即便死亡的概率很小，也要全力保證生命的安全性，為此放棄一些重要的或基本的自由也在所不惜（或者他們就沒有真正重視過自由甚至嘗到自由的真滋味）。我這裡所說的實際存在的價值觀，不是一些知識份子理論上希望人們獲得的價值觀，而是多數人實際持有的價值觀。政治的權力就必須考慮和基本順應這種其治下人們的實際價值觀，而且，在瘟疫的情況下，就像在戰爭的情況下一樣，即便這個社會有持有與多數價值觀不同的異議人士，他們大概也難以抵抗多數的價值觀。在一個社會的內部，多數就可能裹挾少數，如果某個人不服從就要付出一些代價——在有些國家甚至可能是沉重的代價，那就會迫使少數順應多數。

價值觀的排列次序可以是：生命-自由-經濟平等。但還有對整個生命的意義的觀察，比如崇尚來世的宗教信徒對此生生命和永恆生命的權重不一樣等等。對一般人來說，自然還是生命第一，或者說生命至上。其次是自由，再次是經濟收益的平等。但最主要的價值觀差異和衝突還是在生命與自由之間。如果是生命遭到大規模的威脅，一種傳染疾病的致死率很高，肯定要犧牲一些自由；但如果一種傳染疾病的致死率不高，那就要和其他一些價值進行權衡。

抗疫本身就反映了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肯定。生命至上即意味著生命相比於其他價值的優先性、第一性。但是，生命至上並不

意味著生命無價或者說生命可以取代和支配一切其他價值。我們還是要引入“代價”和“成本”的概念。即便是生命這一最寶貴的價值，也還需要考慮“性價比”的計算，這也正是為了落實“生命優先”的價值。因為侵害生命的並不只是一種疾病，並不只是一種病毒，還有其他的嚴重疾病。且除了疾病，還有其他的威脅生命的因素如貧困、饑寒交迫等等。我們不可能為了挽救一個人的生命而忽視其他許多人的生命。我們也不可能為了一種疾病而忽視其他疾病。而且，經濟還是我們保障許多人生命的首要條件，而經濟的發展是很需要自由的活動空間的。人的生活品質的提高和幸福感也是需要較大的自由活動空間的。於是自由就不僅有作為保障生命的工具的價值，以及推進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手段的價值，它本身還有作為“自在自為的目的”的價值。

3. 技術

人只要有精神意識，就會有意發展起對付病毒感染的一些特殊辦法。但是，在漫長的傳統社會裡，這些特殊辦法雖然也可以說是“技術”，但卻是比較原始的“技術”，防疫治病更多的是使用自然手段，比如草藥或帶有就地取材的辦法，並具有很強的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特徵，而不是通過使用精密的科學儀器的反覆實驗，或者是進行嚴密的科學推理的結果。比如中醫，它雖然也有力圖從整體上把握人和疾病的努力，也試圖用一些抽象概念構成體系，但不具備現代科學和實驗的論證。而現代驗證醫學、生物學卻的確深入到了病疫的分子生物學層次，能夠獲得比如像病毒的基因序列，各種疫苗的精細研製和多期臨床驗證等等。這並不是否認過去的人們從經驗中也能獲得一些相當有效的對付病毒細菌的辦法——比如從“人痘”到“牛痘”的偉大發現，就主要是通過經驗發現的。但是，現代科學對各種病原體微生物的認識，各種抗生素的發現，核酸檢測的手段，疫苗和治療用藥的研製，卻遠非傳統技術所能比擬，雖然它們也有可能被誤用或者濫用。

所以說，技術還是可以包括那些自然的經驗療法——那是各文明在千百萬年的存續中積累下來的對付病疫的經驗，是人們在長期的對抗病疫的經歷中摸索出來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這些知識不是一種現代循證醫學的知識，它缺乏理論和明確的理性證據，但還是能發生一定的效果，包括安慰的效果，讓人們心態保持安靜、從而也提高人們的免疫力。只是對這種作用不可誇大。

對付病疫的現代技術首先是醫療技術，這包括預防技術如疫苗、隔離；檢測技術如核酸、抗原等；治療技術如各種有效藥物和 ICU 搶救。我們在最近的一個多世紀裡可以看到檢測技術、藥品、疫苗、治療等方面的長足進展。但是，其他的現代高科技也不可忽視。然而，它們卻常常是一種雙刃劍，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負面的作用。比如現代極其發達的網路傳媒，可以迅速的傳播疾病的資訊和普及防疫的知識，但也可能帶來各種不確乃至錯誤資訊、乃至傳播謠言，帶來恐慌。又如現代高速的交通技術可以迅速的調配醫療力量和物資，但也可能高速和大規模地使疾病蔓延開去。還有像全面電子監控和搜索的技術，以及電子物流、網購等，它們不是直接監控的技術、但卻也讓全面封控能夠實行的技術，這些都可以為嚴格的管控權力所用。

我們經常聽到說抗疫必須以科學為依據，這在科學與權力的關係中是正確的。面對抗擊病疫這一自然災難，權力應該聽科學的而不是相反的。我們應該首先弄清每次抗疫的物件是什麼，它們的嚴重程度，以及在抗疫過程中病毒的變異，傳染率和致死率的變化等等。對於那些突發的致死率很高的病疫，現代技術的作用是明顯的，但對於那些比較溫和的病疫，則可以考慮也借重人們的自然免疫力。尤其是如果毒株已經變得傳染率極高而致死率很低，就應當考慮及時變換策略。而這一切決策都必須以科學技術的探知為依據。

但在強調以科學為依據的時候，我們又要注意，科學技術也並不是唯一的依據和手段。我們還要有人文的關懷，還要接“國情民意”的地氣。至於高科技的另外一面，那些對人類可能產生潛在威脅的技術，比如基因工程、人工智慧，那是另外一個話題，暫不在這裡討論。

4. 權力

權力是指政治權力，在這一對抗疫的分析框架中，主要是指那種高度集中化的權力，有意願並且有能力實行高強度管控的權力，而不是指全部的國家實力或政治權力的全面有效性。

最能體現這種社會管控權力的大概就是隔離了。隔離也就是劃定一個區域不許離開，也不許進入。甚至還有全員轉移到另外一個地區，或者隨時將感染者、密接和次密接強制轉移到方艙等等。我們在這次疫情中可以說發明了許多有關“隔離”的新詞。

隔離是一個對付傳染疾病的行之有效的古老辦法。人們早就知道對於鼠疫、霍亂，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隔離。但古代的隔離缺乏現代技術的支援，經常是無法嚴格實行的。現代社會的政治權力卻是有可能依靠先進的技術實現非常徹底、長期的隔離。

如果說我們面對的疫情是那種致死率很高的傳染疾病，應該說迅速和嚴格的隔離是很需要的。至少這種辦法可以嘗試，也許就阻斷成功了。但如果致死率不是很高，甚至不斷下降，那麼，嚴格的隔離就很可能達不到其目的，不僅有很高的性價比，而且很難長期持續下去。曠日持久的隔離也是一種災難，對人的身心都是一場災難，對社會經濟和交往也是一場災難。所以權力不應當執拗，而應當隨時傾聽人民的呼聲。

此次新冠疫情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僅僅物質和經濟的代價就很大。而是否付出了這些代價，就因此減少了大量的死亡呢？肯定減少了死亡，但看非洲的情況，似乎又讓人產生懷疑，非洲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但也沒有因此就死很多人。在這次新冠疫

情剛開始的時候，人們最擔心的是非洲，認為那裡的公共衛生條件差，國家治理能力也弱，最大的生命損失可能會發生在那裡，但是，事實說明情況並非如此。當然，一種意見會認為：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人類陷在對經濟和物質的追求也已經陷得夠深，也許疫情還能讓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放慢步伐。這種對人類行為的反省似乎深入到更大更深的層面。但在疫情期間的精神損失還是無法彌補，每一個具體的人的死去和親人的悲痛也無法挽回。

上面我提出了一個抗疫的分析框架，後面可以考慮根據其中一些範疇的組合進行更為具體和翔實的分析，從三年多抗疫的事實中演繹出一些模式：比如“高技術—高權力”的模式；“高權力—低技術”的模式；“低技術—低權力”的模式；“高權力—低技術”的模式等等，分別考察其效果。

疫情初期英國首相詹森所說的“群體免疫”，後期比爾·蓋茨所說的“奧密克戎是最好的疫苗。”聽來有些刺耳，但是不是最後還是基本依靠一種比較自然的方式結束了疫情？人類對這次疫情的抗擊是否有些用力過大過猛，乃至讓我們忽略了其他一些人生的重要方面？當然，該人為的還是要積極人為，但該自然而然的也可以基本遵循“自然而然”。技術是有強大作用的，權力也是有強大作用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限度。大自然總是在提醒我們認識生命的限度，人的限度。人的肉體生命本來就是有限度的，從長期的、也是基本邏輯的觀點看問題，所有人都必有一死。我們屢經痛苦可能會發現，更基本的還是自然的力量。面對大自然，技術不是萬能的，權力也不是萬能的，歸根結底，人不是萬能的。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湯瑪斯·索維爾，董玲燕譯：《這才是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Original Work: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 Crawford, Dorothy H. *Viruses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Zimmer, Carl. *A Planet of Virus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